



徽麓书院 国学文库

主编 ◎ 朱汉民



『克己复礼为仁』 研究与争鸣

向世陵◎主编

Kejifuliweiren Yanjiu Yu Zhengming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克己复礼为仁』研究与争鸣

向世陵◎主编

Kejifuliweiren Yanjiu Yu Zhengm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己复礼为仁”研究与争鸣 / 向世陵主编.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6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

ISBN 978-7-5133-3059-6

I. ①克… II. ①向… III. ①克己复礼—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5308号

“克己复礼为仁”研究与争鸣

向世陵 主编

策划统筹: 彭明哲 简以宁

责任编辑: 冯文丹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几木艺创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6

字 数: 450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一版 2018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3059-6

定 价: 9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获得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课题出版资助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
中心工作指导委员会

主 任：许又声

副 主 任：李友志

成 员：李湘舟 王柯敏

吕焕斌 周发源

刘克利

办公室主任：殷晓元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编委会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名）：

汤一介 张岂之 李学勤 杜维明
饶宗颐 袁行霈

主 编：朱汉民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卜宪群 王子今 王继平 张怀承
吕锡琛 刘海峰 朱汉民 李 零
李存山 肖永明 陈 来 陈 致
姜广辉 洪修平 莫砺锋 郭齐勇
黄俊杰 黄朴民 葛兆光 廖可斌

办公室主任：李 兵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总序

朱汉民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借为这个文库作“总序”的机会，我想讨论一下这样几个问题：现代世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传统国学还有什么意义呢？“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国学与岳麓书院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一）国学的意义

我认为，对现代中国和世界而言，国学至少有四个层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国学能够为现代人的个体精神需求提供思想营养。中国正面临社会的急剧变革，每个人的命运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个人的行动也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能够给我们驾驭命运的精神方向、做出行动选择的人生智慧却严重不足。现代中国人往往会感到是非的迷茫、得失的困扰，同时引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社会底层民众是这样，那些成功人士也是如此。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诸子百家的思想，对人生意义的选择，包括是非的迷惘、毁誉的困扰、得失的彷徨，以及对人生终极价值的选择，都能够提供很多很好的思想营养。今天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其实古代先贤都思考过，而且有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回头去看经典，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已经有很好的思考了。

第二，国学能够满足当代社会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并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正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和思想危机。我们常常感到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信任，我们不相信超市里买来的食品是否安全，我们怀疑来自陌生人的帮助是否藏着恶意，我们甚至还在讨论见到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还有许多人损人利己的做法，已经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

诚信危机、道德危机成为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大敌。大家都在想，怎么来制止相关恶劣事件的发生，怎么来建立一个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中国传统国学，对于如何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有着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然是我们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的金科玉律。

第三，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当前的“国学热”其实和中华文明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崛起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崛起是指一个独立的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而中华文明崛起则是强调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体系在经历了近代化、全球化的“浴火”之后，重新成为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原生形态的古文明，并且一直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位居世界文明的前列。但是，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被瓜分、侵略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开始失去文明的自信。其实，近代中国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采取对自我文化的虚无态度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必须有一种文明的自我意识，我们要认识到，现代化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崛起。我们活下来并且能够昂首挺胸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首先应该是我们高贵的精神和灵魂！那么，我们高贵的精神和我们的灵魂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就是国学熔铸了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

第四，国学能够为 21 世纪新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重要的贡献。我一直认为，中国国学里面所包含的许多价值观念，比方说仁爱、中和、大同，不仅仅对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们一定能够成为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能够弥补某种单一文明主导的价值观念的缺失。西方文明一直在坚持他们倡导的许多核心价值。其实，中华文明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这种西方价值的过程。但是，许多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却忽略或者忘记了中华文明中的价值理念。特别是在整个 20 世纪的文明史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

代文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21 世纪建构的人类文明，一定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而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一定会对 21 世纪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尽管国学如此重要，但对国学是否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学界内部还存在着不少疑虑与分歧。人们首先会问，国学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其实，“国学”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和外延。首先，“国学”的“国”应该是指中国，这个很明确。其次，这个“学”就是指传统学术，即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总是要通过文字、典籍的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有经、史、子、集，所以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往往也分为经、史、子、集。

人们又会进一步追问：国学的知识架构和学理依据是什么？当然，国学之所以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要有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国学学科体系的内在条件，即国学体系的知识架构和学理依据；其二是国学的存在条件，即国学能否具有现代学术视野而得到普遍承认并开展广泛的或全球化的学术交流。

国学这门学科，之所以在学界还有不少疑虑与分歧，与它在当代中国学术体制内的处境有关。现在大学院系的分科，基本上是近代引进西学而建立起来，分为理学、工学、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等。尽管近些年各个大学纷纷创建了国学院，但是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内并无合法性的身份。这样，我们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国学，在这种学科体制下只能变成其他学科的材料。比如国学中最重要的经学，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中就没有合法的独立地位，我们不能独立地研究、学习经学，只能够将其分别切割到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这样，国学中的经、史、子、集的不同门类知识，全部被分解到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视野里面，变成其他不同学科的材料。

近代引进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不同学

科，对于拓展我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视野，确实有它的长处，但也有其短处。中国传统学术是一个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其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有着内在联系。当我们用各门现代学科把传统国学分割之后，就有可能失去原来知识体系的联系和特点。每一种知识体系或学科框架，实际上是我们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具有主观性因素的图式。不同文明有不同的把握世界的图式，西方知识学有它自己的长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有自己的长处，譬如中国的知识传统具有整体性、实践性、辩证性的特点，以此成就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贡献。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保持对其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的思考。国学作为这样一种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其实，在讲到中国“国学”合法性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暂且借用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的概念。在西方世界许多大学都设立了古典学系。这个古典学研究什么呢？它最初是以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的特点是注重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分别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在西方，古典学一直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我们认为，“国学”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学”。如果我们用“中国古典学”来说明中国“国学”，可以提供“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上述两个条件。一方面，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明体系。建立“中国古典学”，也就是以中国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由于“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架构、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学科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学”概念仅仅能够为中国人自己使用，西方人则只能使用汉学，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国学”具有了知识共享、学术交流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

（三）国学与岳麓书院

书院是一种由古代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学术教育机构，它形成了一套

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基本规制、讲学形式，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书院继承、发扬了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表现出儒家士大夫那种追求独立的学术思考、人格自由的精神。书院将中国传统教育和传统学术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宋元明清学术文化思潮迭起，无不与书院这种独特学术教育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杰出代表，在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卓著的学术成就，受到古今人们的普遍敬仰。继先秦诸子等学术思潮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思潮。理学以复兴先秦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同时，它又吸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学说，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岳麓书院创建于宋代，很快成为新兴理学思潮的大本营，学术界一大批有影响的著名理学家纷纷讲学于此。南宋乾道年间，被称为“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主持岳麓书院讲席，在此聚集了一大批理学之士，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同时，后来被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著名理学家朱熹两次在岳麓书院讲学传道，更是形成了学术鼎盛的历史局面。岳麓书院成为宋代学术文化史最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以后，许多著名理学家纷纷来此讲学。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讲学岳麓书院；明代中叶以后，理学思潮中的心学一派王阳明及其弟子王乔龄、张元忬、季本、邹元标等亦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使岳麓书院因新兴的心学思潮再度发挥极其重要的学术大本营的作用。明清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又发生重大变革，先后出现清代理学、乾嘉汉学、今文经学等不同的学术思潮，而岳麓书院一直是不同时期内学术思潮的重镇，从而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的创新发展，继续在中国学术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可见，岳麓书院在一千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一直是中国传统国学的重镇。宋以后的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均以它为学术基地，如宋代理学派、事功学派，明代心学派、东林学派，清代乾嘉学派、今文学派等等，许多学术大师如朱熹、张栻、陈傅良、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皮锡瑞等在这里传道授业，培养了一代代国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诏全国各地改书院为学堂，岳麓书院也

于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后来又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湖南大学。但岳麓书院遗址在战乱年代，一度受到严重损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湖南大学全面修复岳麓书院，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岳麓书院古建全面修复，基本上恢复了历史上办学最盛时期的建筑规制。与此同时，我们启动了岳麓书院国学研究、教育的复兴工程。近二十多年来，岳麓书院培养、引进了一批国学研究的学者，逐步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岳麓书院学术、教育功能的恢复，是建立在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及学科建设基础之上的。今天的岳麓书院已经成为国学复兴的重镇。岳麓书院的明伦堂仍是讲授国学的讲堂；朱熹、张栻“会讲”的讲堂仍在举办国学论坛，斋舍也仍然是学者从事国学研究的场所。古代学术传统内核的经学、理学、诸子学、史学及其相关的知识学问，均成为岳麓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和重要研究方向。国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文化类型，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学术文化，国学确实不同于西学，因为它有不同于西学的文化土壤与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与书院有着共生的独特文化背景。

我们有一种传承中华学脉的强烈愿望，希望推动岳麓书院学术的现代复兴。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要文化教育现象。我们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完全可以做好书院文化传统的转换、创新工作。所以，我们编辑、出版“岳麓书院国学文库”，也是与传统国学的当代复兴有着密切关联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书院、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来，盼望国学界的研究者能够不断赐稿，共同推动当代国学的繁荣！

甲午年于岳麓书院文昌阁

序

本书的缘起，系我 2005 年冬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时，其时担任学社社长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的提议。杜先生作为海外当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对儒家经典的解读颇为关注，除了组织研讨传统儒家典籍之外，更在孔子和《论语》思想的疏释上匠心独运，颇有新的创发。在访学期间，杜先生每每提及的一件事，便是希望能在“文革”三十年后，将学界对“文革”中在否定层面传播得最为广泛的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及其思想的再认识，收集汇编成书，以使国人能对这一事关孔子思想核心的命题，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我深以杜先生的提议为然并乐意来承担这样一项任务，在杜先生的鼓励下，我将初步收集的材料在杜先生的社长官邸中对学社同仁作了相关的介绍。回国后，由于不得不服从于越来越量化的教学科研秩序和不同途径的交办任务，此书的编纂便拖了下来。好在有杜先生的大力支持，有我的学生们的积极参与，最终完成了这一任务。

我最初接触“克己复礼为仁”的问题，也是我学习中国哲学史的开始。那是在上个世纪的 1973 年末，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起来，我在家乡南充市图书馆借了当时有影响又比较易懂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一书开始阅读。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使自己对这些问题有更深一些的了解，又自觉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从一本书扩大到四本书，即加上这位作者的另一本《中国古代思想史》，冯友兰先生的《论孔丘》和冯天瑜先生的《孔丘教

育思想批判》。但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著作，因为领会孔子的思想不能局限于孔子自身，还需要联系到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并且也希望从了解孔子思想入手去认识几千年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于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由于当时林彪的条幅中只用了“克己复礼”四字，后来的批判也集中在这四字，用此四字来表述孔子的思想便成为流行的做法。受此影响，至今人们提及这一命题时，仍然是简约化的“克己复礼”，而非“克己复礼为仁”的全句。也正因为如此，本书不着意区分“克己复礼”与“克己复礼为仁”的不同表述，而是二者通用，可简则简。

可以说，四十年前对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批判，首先是一种阶级立场的批判，即按照当时流行的古代社会分期法，将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从战国（按郭沫若先生主张的公元前475年）起算，孔子生活的年代正值奴隶社会的末期，而孔子“吾从周”的自觉意识和他对文王、周公的仰慕，使得他当然地成为已经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顺理成章地，孔子的“克己复礼”说就演绎成逆“礼坏乐崩”的历史潮流而动，要民众克制自己的寻求幸福生活的愿望而复辟西周奴隶制度的反动观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学术界开始认真清理“文革”时期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包括“克己复礼”在内的传统思想的认识，并在新的环境下对此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在今天来回顾“文革”后四十年的“克己复礼为仁”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多姿多彩的局面，它不仅在祖国内地、也在海外展开，并产生了新的争鸣。事实上，由于孔子当时心中所想不可能再现，“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以及孔子在这方面的系统思想，无论多么严格和客观，也不过是尽量参照当时的环境和孔子的其他思想来辅助推测，所以要真正弄明白该命题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含义，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批评可以解决的。

围绕“克己复礼为仁”的讨论，主要分为经学上的和哲学上（或思想上）的两大类，当然二者的联系是肯定的。一般地说，经学上的字词辨析，古来已经不少，谓之汗牛充栋亦无不可。但为何人们还有那么多的分歧，显然仅仅靠经学的字词注解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的；但换以哲学的思辨去解释，同

样也会遇到不小的挑战，也不易在学界取得共识。但通过这样的讨论，能使我们对孔子时代的社会状况和该命题的思想实质有更深入的了解，则无疑是这四十年间不断争鸣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立足经学层面的考据，到目前为止仍以赵纪彬先生《论语新探》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考证最详。正是因为如此，这一长篇文字虽不属于“文革”之后，但考虑到它的影响，仍然将其选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赵先生虽然反对流行的以朱熹注解为典范的“克己复礼”说¹，比方有学者便以为：“（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动，恢复到原有的（奴隶制的）礼制范围，这样才叫做仁。”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将孔子及其思想判定为替没落奴隶主阶级作辩护，以阻止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仅此可以说明，将分歧最大的“克己”解释为“己能”、“修身”还是“克制己欲”，与是否采用阶级分析法并无直接关系。

可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作用，我开初是作为一名备感自豪的工人阶级成员（车工），从响应毛主席号召和个人兴趣出发，读当时流行著作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一下便接受了，之后的几十年中，观点居然一直没有变化，尽管我早已是一名中国哲学史专业工作者。2000年，为满足中国人民大学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由我负责主编的《中国哲学智慧》出版，其中先秦部分由我撰写。此书出版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和全国许多院校采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目前已出版了第3版。新版在“仁爱”的看法上，观点要更为全面，但对于“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说我仍坚持了一贯的立场。

其实，从方法的层面说，“克己复礼为仁”如同中国哲学史的其他某些重要观点一样，有不同的解释是很正常的。百家争鸣就在于见仁见智，对于所谓“误读”的担心其实并无必要。譬如《论语》中提及的“吾与点也”、“孔颜乐处”的境界，“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引起的困惑等，都是长期引起争论而难以有终极结论的问题。对于“克己复礼为仁”

1 参见本书所编入的赵纪彬先生《论语新探》的相关部分，此处从略。

2 见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版，第94页。

的多解，也不必强求为一。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淡漠了自己的观点，我对自己的观点还是比较执着的。

在我看来，中国哲学范畴命题的考释，有两个原则是应当要遵守的。其一是经学的原则，即所解要有汉唐经学的论据支持。其二是文化的原则，即所解要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就本书所收集的论著看，遵守第一个原则应当没有问题，所解大都引有汉唐经学的注疏根据；问题通常发生在第二个原则上，即如何判定孔子说话时的意图。我的理解是，孔子既然谈“复礼”并关涉到“天下”，就不是仅仅着眼于个人的修身，而是希望推行于天下；而要在天下推行，联系到统治者就是必不可少的。对于统治者来说，“克己”主要在约束其欲望，事实上，“礼坏乐崩”往往是由统治者的欲望过当而起。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不能忍受；冉有、子路帮助季氏谋划攻打颛臾，孔子十分生气，责备说“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并提出了经典的以“均平”为核心的治国指导思想。统治者约束其欲望，百姓万民随其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复礼”、“归仁”的天下太平景象。

在传统社会，统治者的欲壑难填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老子讲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见《老子·七十五章》）。社会动乱也就不可能根本得到救治。从文明史的演进说，贪欲本来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大动力，这是恩格斯已经总结过的道理。但在中国哲人尤其是儒家学者的眼中，这却是最不合理的事情，从孔子到以后的历代儒家对此都有深刻明白的揭示。因此，要恰当地解释“克己复礼为仁”，第二个原则可能更为重要。过分执着于章句注疏上的争执，往往容易走向繁琐，进而使人不得要领，这在经学史上是有教训的，汉学也因而被随后强调得意忘言的玄学所超越。

回到“克己复礼为仁”句，结合颜渊个人的心性修养看，孔子既称赞他“好学”又明言其“不迁怒，不贰过”，其修身实际已臻于完善。这“二不”与“四勿”结合起来，从结果看是德行纯熟而不再有强力的克制；但从起初或颜渊自己所说的“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来说，则显然属于意志和决心的作为，是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过当、不非礼——“怒”或“过”本来都属于

欲望的范畴。

杜维明先生当年以“修身”解“克己”在海外曾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我虽然不直接以“修身”为解，但又认为“克制或约束自己的欲望”与“修身”本来可以协调，因为理学家自身就是以克制己私为修身之阶梯，不然便不好理解作为理学修身工夫主干的存心去欲之方——身之不正往往由欲之过当而起也。理学家都是宣称“遥接”孟子的，而孟子在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性善说。事实上，“性善”是主张解“克己”为“己能”和“修身”等意见的学者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即因为性善，人就能够从弘扬善心（养心）出发践行礼义，“复礼”便已在不言之中了。但这里的问题，一是以性善为基点难以联系到孔子；二是更重要的，孟子支持性善的“养心”说刚好是与“寡欲”说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见《孟子·尽心下》）。人能否“存心”以弘扬善，关键在是否能够“寡欲”，只有“寡欲”，善心才可能保存并得以扩充。

而且，问题还可以引申一下。孟子论证性善的重要根据在仁义礼智“我固有之”。“礼”在这里是四端之一，与在仁礼关系的对子中，礼通常是作为外在规范的情况有所不同。进而，人所要做的，乃是“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孟子·公孙丑上》），一切都取决于自我内在的努力。就是说，如果严格限定于性善，限定于“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复礼”本身已没有存在的可能，即缺乏必要的心性论的根据。反之，如果将此放到荀子性恶论的背景下，“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则只能走向恶（《荀子·性恶》），“己能”复礼就更谈不上。

推广开来，从克制欲望的消极层面讲“克己”，比从弘扬善心的积极层面讲“修身”，在通常情况下更真实可信。人所以需要存心，是因为心不但有发明光大的问题，更有被物欲引诱而损害丢失的问题。孟子指明，人心有可能像鸡犬一样被放失，所以学问的道理就在于“求其放心”（见《孟子·告子上》）。正因为如此，积极层面的存心养性工夫，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如何能使被物欲所感的心思安静下来。本来，欲望是修养工夫的大敌。《乐